

东亚汉文化圈与

中国关系

石源华 胡礼忠◎主编



DONGYA
HAN WENHUAQUAN
YU ZHONGGUO
GUANX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亚汉文化圈与 中国关系

石源华 胡礼忠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2004 年年会/石源华，胡礼忠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0

ISBN 7-5004-5237-3

I. 东… II. ①石… ②胡… III. ①汉语—文化—研究—东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1—53 ②D829.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6237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耿昇会长希望上海方面能就东亚问题举办一次学会年会。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会同人几经商议，并得到韩国学术振兴财团和两校科研处的鼎力支持和资助，终能决定以“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为主题，由两校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共同举办 2004 年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因 SARS 关系，会议从 2003 年 10 月延至 2004 年 2 月在复旦大学举行。

本次会议得到海内外学者、尤其是学会同人的热情支持，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韩国、日本和美国的 15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提交论文近 80 篇，是近年来中外关系史学界一次规模较大、层次和水平较高的学术盛会。

以“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为会议主题，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第一，东亚汉文化圈是文化先进的中国与周边近邻互相促进，共同构建的同质文化圈，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体化”区域联合体，研究其形成和发展的缘由、特点及其中衰和裂变的成因、教训，不仅对于中外关系史和亚洲史学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当今研讨东亚区域合作、建立具有东方特色的东亚政治经济共同体，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第

二，东亚各国的崛起和“东亚文化圈”的重构，已为世人所高度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出现了强劲的复兴势头，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以及随后的中国崛起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力，显示了东亚文化价值观的魅力和威力，使近代以来为西方文化所压抑的东方文化重新活跃起来，使沉寂数十年的东西文化优劣之争再现历史舞台，其发展前景令人鼓舞。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东亚汉文化圈”核心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文化辐射力的亚洲大国和文明中心，其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将不仅是地区性的，而且也必将是全球性的，“东亚汉文化圈”的复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研究“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与明确“中国崛起”与“亚洲振兴”的关系，制定以追求长期和平为目标、以共同繁荣为依归的亚洲战略。

在“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的总主题下，本次会议从历史、现状和未来三个时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角度研讨东亚汉文化圈及汉文化圈国家间互相关系的形成过程、历史演变、现实状况及未来发展走向。其具体议题主要有：

1. 中华帝国时代：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关系体系以及东亚国家在汉文化圈中的地位与作用。

2. 列强东侵时代：中国与汉文化圈关系的裂变暨日本灭亡韩国、侵略中国对于汉文化圈的冲击。

3.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汉文化圈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互相支持暨东亚民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大意义。

4. 冷战时代：中国与汉文化圈国家关系的扭曲暨中国的东亚政策。

5. 后冷战时代：中国与汉文化圈国家关系的全面调整暨中国的东亚政策。

6.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汉文化圈国家间实现区域合作的前景、模式暨 21 世纪中国与东亚关系的瞻望。

与会代表在研讨中尤对“东亚汉文化圈”的概念、地域界定、辉煌时代、中衰裂变、再造重构、未来走向等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于推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服务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重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集的选编出版，是在耿昇会长指导下进行的。所有入选论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出于财力方面的限制，我们只能从提交会议的众多论文中选择部分论文结集出版，并在书末附载代表的全部参会论文题目。我们向所有的与会代表，尤其是提交了论文又未能入选论文集的代表为本次会议做出的贡献，表示特别的敬意和谢意，并敬请谅解。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承办，两单位的李花玉老师，博士研究生欧阳小刚、仇发华，硕士研究生居新平、廖育人、袁蕾等承担了会务工作，论文集的编务工作由欧阳小刚承担，对于他们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一并深表谢意！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石源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胡礼忠

2004 年 6 月 20 日

目 录

序言	石源华、胡礼忠(1)
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	周 宁(1)
文化传统在现代性多元发展中的角色地位与 历史使命	姜义华(16)
全球化与东亚历史	[日] 滨下武志(24)
21 世纪和中庸	[韩] 沈伯刚(33)
诤论汉文化圈	羽离子(38)
地理环境、交流与东亚文化区的形成和变迁	吴松弟(53)
东方封贡体系与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	黄鸿钊(66)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孙 泓(85)
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各国交往中使用的语言 与相关问题	
——以唐、日本、新罗和渤海为中心	马一虹(99)
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	韩 昇(120)
两晋南朝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	石云涛(138)
隋朝帝国的创立与东亚关系的整合	李鸿宾(154)
唐五代时期道教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 ——以金可记、崔致远为中心	张泽洪(168)

档案所见明后期中朝关系史事	万 明(185)
明清之际儒学东渐日本再探讨	朱亚非(202)
从《热河日记》看 18 世纪中韩文化交流	吴伯娅(219)
北京琉璃厂与清代中韩文化交流	杨雨蕾(229)
中国正史中的日本观	滕 军(249)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罗历山及其对“东京王国” 的研究	耿 昇(261)
论近代远东国际关系的变迁与中国的周边 外交	石源华(283)
从近代博览会看到的中日关系	[韩] 河世凤(302)
中日两国对外来文化的不同反应 ——以铁路为例	祝曙光(315)
近代日本非政府团体的对华政策理念 ——东亚同文会为例	翟 新(332)
汉文·韩文·英文·日文 ——欧美新教传教士近代在韩办学的 文字选择	王立诚(359)
东亚文化圈发展的展望	孙进己(373)
“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崛起战略架构 下的中国周边外交	汪伟民(380)
论 21 世纪全球化时代韩国与中国合作关系的前景 和模式	[韩] 李奎泰(393)
中日关系的心理障碍	[日] 鹿锡俊(413)
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和东南亚华文教育的 振兴	庄国土(428)
20 世纪末的一次重要学案 ——80 年代史华慈对东亚政治	

秩序问题讨论的组织和研究	朱政惠(443)
--------------------	----------

附录一 “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 会议参会论文目录.....	(458)
--	-------

附录二 “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 会议综述.....	(462)
------------------------------------	-------

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

周 宁

布罗代尔提出：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任何所谓普遍有效的假设，诸如理性或进步、自由，都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尺度。^[1]本文试图在宏观历史视野中探讨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影响。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华夏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共同书写了整部世界文明史。公元第一个一千年里，中华文化创立了华夏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统一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在整个东亚与部分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公元第二个一千年里，中华文化转动世界，不仅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且准备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之后，终于在第三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世界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形成创造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笔者以世界的现代化为立足点，重整世界文明史中的中华文化遗产。



公元第一个一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普世主义理想，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类型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公元第一个一千年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历史意义上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目前的问题是，在公元第二个一千年里，这种贡献是否还在持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又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华文化是否具有现代意义，或者只能作为现代性文化的“他者”出现？

唐宋中国五百年，不仅是中国文明自身历史的峰巅，也是同时代世界文明的峰巅。我们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三个层次上理解文化的概念，在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中清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化资源，发现中华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形成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二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启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并完成自身从相对衰落到由边缘而中心的复兴。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

力和影响。”^[2]遗憾的是 17 世纪最博学的英国人培根对那些改变世界的发明“的起源……模糊不清”，20 世纪他的同胞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证明那些伟大的发明都来自宋代中国。

宋元时代开始，中华文化的影响，开始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发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发现中国。现实世界的旅行将商人、传教士等带到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真正划时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是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了新观念，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中国形象成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不论其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表现出欧洲文化的向往。这是研究西方现代性文化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象在改变着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甚至诱发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的动机与灵感。马可·波罗那一代旅行家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而发现中国的最大意义是直接导致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中，有着中华文化形象的影响。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使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家乡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世俗天堂在亚洲的东部，在富强的“大汗的国土”。哥伦布远航的动机是寻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国土，整个航程中他都期待着某天清晨在前方海面上出现耀眼的金屋顶。西方人为了发现一片旧大陆，发现了新大陆；为了发现中国，他们发现了世界。蒙元世纪创造的契丹形象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创造性影响，在于它成为地理大发现最初的动机与

灵感之一。

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一步理想化的同时，显示出更多的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第一次使中国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西方文化精神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内召唤与塑造的中国形象，都有一种特定的文化动机。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是一段刺激有趣的传奇故事，对于初入现代文明的欧洲，它将表现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动力，甚至开始扮演精英文化中的某种社会理想。

令人惊叹的中华文明为文艺复兴文化提供了一个自新与自我超越的楷模。中国形象进一步被理想化，它的文化象征意义越来越丰富，不仅表现了西方现代世俗精神、绝对君权，还开始具有某些政治宗教与道德哲学的启示。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宗教宽容、汉语的普世语言特征与中国人的勤劳，在迈入现代历史的西方文化中都表现为一种特有的、值得赞美与仿效的“中国价值”。大中华帝国的形象，是西方进入现代意识时那种好奇与开放精神的产物。在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西方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楷模，遥远的中国又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欧洲将有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层次上利用中国。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中国形象更加明晰、具体，从民间文化进入精英文化，并带有某些严肃的、激进的色彩。中国形象将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它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

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

“中国潮”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与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3]

“中国潮”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热情，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4] 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

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5]

在西方的启蒙文化中，中国形象逐渐变得丰满、逼真、敏感、有力，那是一个尺度、一种视野，不管你在其中看到威胁还是看到希望，感到恐慌还是感到激动。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的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启蒙哲学家对中国形象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他们构筑的开明的中华帝国形象中。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启蒙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的赞扬，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他们发现中国文官制度中隐含的民权、平等观念。在此中国形象的意义不仅是积极的，可能还是革命性的。中国形象昭示一种与贵族法权相对的平民政治，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如人民、平等等，都是杜赫德、伏尔泰、魁奈那一代人在共同人性与世界文明视野内从中国形象中植入的。^[6]

二

中国形象在西方达到高潮，中国的衰落即将开始。1750年前后是世界文明格局中大国势力均衡的转折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殖民扩张，使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胜出东方文明。在西方飞速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相对而言落后了。中国从发动世界的轴心逐渐变成被西方中心冲击带动的世界边缘，它不仅降低了中国的国力，也一度动摇了华夏文化的价值与世界影响。我们承认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但是，既不能将这种落后的时段在历史中加长，也不能将落后作为非历史的所谓文明本质在观念中绝对化。

中国在比较文明史视野内的相对落后，并不像流行观点想象得那么久。明清帝国明富清强。明末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技术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清朝康乾盛世的国力并不亚于汉唐盛世，也不亚于正如日中天的英国。马戛尔尼访华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实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欧洲，即使在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时代，中国出版的书籍总数比整个欧洲还多。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开始衰落，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如人口膨胀超出农业经济的限度，帝制周期性的政治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世界平衡。落后的原因是封闭。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总是从自身扩张的角度强调中国的文化自大与封闭。实际上华夏文明不仅不比西方文明更加自我中心、文化自大，明清社会也并不像一般想象得那样封闭。明清间中国内外都发生了一次贸易革命，国内出现了晋商、徽商、宁波与广州商人的大商业集团，贸易加强了

人口流动、城市化程度，改变了社会结构。明末中国已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确立了银本位的世贸体系中的中国中心。满清也并不像想象得那么保守，康熙皇帝认真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技，世界贸易的成果也已反映到当时的城市日常生活中。《红楼梦》写宝玉八岁随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52回），冯紫英送给贾政四样洋货，其中一个是三尺多高的自鸣钟（92回），宝玉房中有一个“金西洋自行船”摆设（57回），晴雯感冒，宝玉取鼻烟给她嗅，鼻烟盒上装饰着天使像（“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又让麝月去凤姐处取一种名叫“依弗哪”的“西洋贴头痛的膏子药”（52回）。

中国落后，并不像一般想象得那么久，也并非像某些玄奥的理论论证的那样是由某种中华文化的本质注定的、必然而不可逆转的。黑格尔断定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停滞在历史的起点上，没有进步也没有未来。马克斯·韦伯假设文化对人与历史命运的塑造，探讨所谓“西方个性”与“亚洲个性的结构”，他认为西方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新教伦理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尽管亚洲社会、政治、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都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们的理论不管显得如何“科学”，总是一种东方主义式的话语，包藏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霸权。笔者曾经关注西方的“汉学主义”话语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设立了观念陷阱，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分外艰难。^[7]

中华文化，即使在衰落与动荡的年代，也未停止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世界现代化的中国经验维面。在世界现代历史上，中华文化的世界贡献依旧体现在华夏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两个方面，我们首先看西方文化圈。

中华文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影响，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三个阶段，“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过程上基本相同。